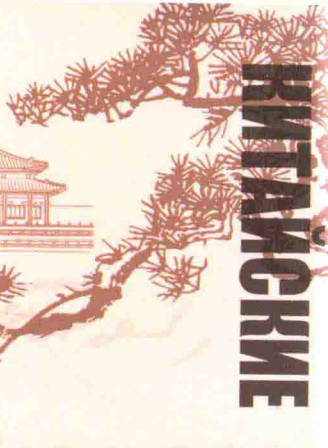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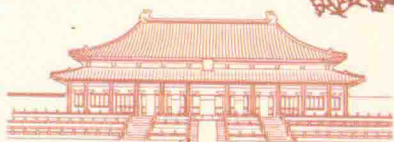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俄语诗行里的 中国形象

谷羽 编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КИТАЙ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СТРОЧКАХ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俄语诗行里的 中国形象

谷羽 编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 / 谷羽编译.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2.3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310-06235-5

I. ①俄… II. ①谷… III. ①诗歌研究—俄罗斯②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IV. ①I512.072②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80768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
EYU SHIHANG LI DE ZHONGGUO XINGXIANG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陈敬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https://nkup.nankai.edu.cn>

河北文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2年3月第1版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230×155毫米 16开本 27印张 1插页 374千字

定价: 98.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8339

诗歌以外的感受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俄罗斯,没有哪个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精英对中国连续保持3个多世纪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诗人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中国题材诗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互为邻国,有悠久而密切的交往历史,还因为俄罗斯文化兼具东西文明的特质,俄罗斯作家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情感和认知力。

将描写中国事物和包含中国意象的俄语诗歌尽可能集齐并在中国翻译出版,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创意,很符合当下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国的现实。谷羽先生在6年前就开始实现自己的宏愿,于2017年初给我传来他修改补充后的编写提纲。他在来信中说:“我把《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书稿提纲做了修改补充,寄给您过目。有空时请把18世纪相关著述寄给我。”由于正值南开大学迎接百年华诞,该书被列入了“南开百年学术文库”,作为2019年百年校庆的献礼。与此同时,先生开始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俄译工作,获得了两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独立或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今诗歌俄译本,如俄语译本《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中国当代诗选《风的形状》、汉俄对照中国诗歌系列读本《唐诗读本》《宋词读本》《元曲读本》《李白诗读本》《当代诗读本》(三册)等。可以说,谷先生是当代中国

俄译中国诗歌用力最勤、成果最丰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2021年4月5日,先生通过E-mail一下子寄来了5部书稿。他几乎将中国题材的俄语诗歌搜罗殆尽,并且都翻译成了中文,按照时代和内容特征巧妙地编排成集。先生2002年退休,到今年正好是20年。尽管在这20年间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的老当益壮,年年都能看到他有多种新作问世,但对于一位八秩老人而言,这样的“爆发力”还真把我惊到了!在敬佩和感动中我回复先生:“谷老师,收到了,您太伟大了!”次日,先生来信说:“伟大,这个词我可担不起。感谢您的抬爱。昨天匆匆忙忙,信中好几处错字,对不起!这几本书稿,又有所补充和修改,再发一次。前面发的书稿可删除。”说实话,我因忙于行政和教学工作,还没来得及看书稿,可先生已经把修订过的新版本传来了,真令我惭愧。而后,为了能够完整地呈现俄语诗人中国书写的历史和题材,先生又从5部书稿中精选佳作,编成了此书。

《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主要收录了18世纪以来61位俄语诗人的中国题材诗作,共三百多首,23200行。作者主体为俄罗斯诗人,也包括少量以俄语进行创作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以色列诗人。将3个多世纪以来俄语诗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创作的散落于各种报刊杂志中的描写中国的诗歌收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而对其从内容和艺术上进行甄别筛选,更需要译者兼具诗人和翻译家的双重素质和体验。通过先生优雅的译笔,《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中的每一首诗都用汉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我国读者得以在俄语诗歌的意象中感受中国风物乃至中国文化的别样情调,体会两国人民深厚而悠久的情感渊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进一步增进中俄世代友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作用。

我和先生经常通电话,但话题永远只有学术,他总是兴奋地告诉我最近出版了什么著作,完成了什么书稿,正在酝酿着什么计划。当然,也会谈及他与中俄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交往、互动与合作,这是因为先生的朋友圈很大,交际很广,有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也有俄罗斯的汉学家,有俄罗斯的作家,也有中国的诗人。在先生“休息”

的这20年中,一共出版了42种译著、1部文集,主编或主持翻译著作3部。我经常对先生说,您在“休息”中做出的成绩,让我们这些上班在岗的人汗颜。2015年先生获“安年斯基诗歌翻译奖”和“深圳十大好书评选年度致敬译者提名奖”,2019年又获《诗刊》“2018年度陈子昂翻译家奖”和“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我不是谷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了三十多年。无论是人品还是学品,先生都堪称世范楷模,对我影响甚大。先生让我作序,我除了感觉自己学养不够以外,还有“心理障碍”,总觉得这是对先生的不敬。拒绝了多次,也拖了好久,老先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让我必须完成“作业”。几天前先生下了“最后通牒”,说书稿三审已经通过了,“现在就等着您的序言了”。为了不让先生着急,也不耽误出版进程,只好冒着僭越之嫌写下以上感受。

阎国栋

2022年1月13日

(序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活水长流与情感共鸣

——《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自序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的这首《观书有感》，是广为人知的传世佳作。诗人借助方塘活水的生动意象，说明读书求知使人心胸澄澈的道理。

当代著名学者、《汉学研究》主编阎纯德教授描绘汉学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借用了“活水”这一意象。他说：“中国文化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去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因子，又有异质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①

阎纯德先生的学术视野开阔，他所关注的不是半亩方塘的天光

^① 阎纯德：《比较文化视野里的汉学和汉学研究（代序）》，《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20，转引自阎国栋著《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第680—681页。

云影,而是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交流,展现出当代中国学人的开阔胸襟和远大目光。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凝聚着古代先哲智慧的《易经》《道德经》《论语》,就是中国文化“活水”的源头,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这生生不息的“活水”不仅滋润着世世代代的中国文人,也引起了近代国外汉学家的关注与推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十大名人,孔子位居第一^①;《道德经》是外语译本最多的古代典籍之一。这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国文化的“活水”流出国境,流向世界,离不开国内学者的研究、传承、发扬光大,同样离不开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翻译、评介与传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说起来是规模宏大的工程,其实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现的。

中国经典感动了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他们满怀热情地把优秀的作品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帮助中国文化的“活水”流进他们的文坛诗苑,读者读了这些译作,受到感动,引发情感共鸣,如果他是诗人,就会写出回应的诗篇。这样,中国作品就从走出去,更进一步,能叩开读者的心扉,让中国诗词的“活水”,滋润他们的心田。在这个过程中,汉学家和翻译家起到了引水灌溉、开辟出一片文化园地的作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步伐正在加速,取得了了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科学技术的突破创新,有助于实现中国人的梦想,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依次是: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思想家、教育家;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阿奎纳(约1225—1274),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牛顿(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作家;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

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与俄罗斯文化的交流处于重要地位。俄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比欧洲人略晚。17世纪,他们借助欧洲有关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了解中国,这成为俄罗斯社会上层人士认知中国文化的一个渠道。

18世纪,有些法国传教士翻译的中国作品传到了俄罗斯,比如依据《赵氏孤儿》翻译的剧本《中国孤儿》,还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等话本小说,在俄罗斯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苏马罗科夫(1717—1777)就根据法译本翻译了《中国孤儿》的片段台词。

18世纪欧洲推崇东方文明的“中国风”也吹到了俄罗斯。杰尔查文(1743—1816)和拉季舍夫(1749—1802)的诗行里,都出现了赞美孔夫子贤明的词句。而圣彼得堡皇家园林里更是修建了中国式剧院、中式拱桥、中式凉亭,湖泊里的石舫跟北京颐和园的石舫相似,只不过规模稍微小一点儿。庞大的夏宫里有一座蓝厅,陈列着中国的典雅瓷瓶,墙壁上蓝色丝绸刺绣着树木、花草、人物、禽鸟,一派中国田园风光。而皇村学校就坐落在夏宫的翼楼里,那就是普希金(1799—1837)当年读书的皇村学校。正是在这里学习期间,14岁的少年普希金写下了抒情诗《给娜塔丽娅》,提到了“谦恭礼貌的中国人”,自我调侃是个“苦行僧”。

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777—1853),作为俄罗斯修士大司祭、第九届宗教使团团团长,曾留居中国14年(1807—1821),此人博学多识,译著有《四书》《大清一统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教育》等,还有《三字经》的诗体译本(1829)。比丘林把《三字经》题写赠言送给诗人普希金,诗人认为这本书是“儿童百科全书”。他在转年创作的一首诗中,想离开俄罗斯,“走到长城脚下”,渴望访问中国,显然跟汉学家比丘林的交往有关。

继比丘林之后,另一位汉学家王西里(1818—1900),在翻译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居功至伟,他就是瓦西里·帕甫罗维奇·瓦西里

耶夫院士。1840至1850年作为俄罗斯宗教使团随员,他在北京学习、生活长达10年之久。回国后成为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他翻译了《诗经·国风》当中的128首诗,1880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在这部著作当中,他把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与普希金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他跟俄罗斯纯艺术派诗人费特(1820—1892)是好朋友,他把苏轼的绝句《花影》翻译成逐词逐句的初稿,经过费特加工润色、诗化提升,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1856年第5期,成为正式出现在俄国报刊的第一首中国古诗俄译本。

翻译与解读中国经典文本成为俄国汉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王西里认为《诗经》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根基。在他看来,“国风”中的歌谣“是人民创造的,令人愉快的是,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人,而不是那些戴着面具的伪君子。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人同样有一颗单纯、友好、充满人性的心灵,有与我们一样的悲欢离合之情”^①。在他看来,《诗经》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其所反映的人民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使之具有了全人类的价值。

在认知与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方面,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9—1910)同样功不可没。1878年,他开始接触《道德经》,后来阅读《论语》《孟子》的英语译本,1884年写出了短文《孔子的著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有4亿5千万人,几乎比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一倍。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平和的民族。他们不需要外国的领土,他们也不喜欢打仗。中国人是农耕民族。他们的皇帝亲自示范耕作。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爱好和平的原因。”^②托尔斯泰赞赏老子的“无为”,墨翟的“兼爱”。他的这些观点在俄罗斯精英阶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① [俄]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阎国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13页。

② 《托尔斯泰全集》(91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37,第25卷,第532页。

比丘林、王西里、托尔斯泰对于中国文化这股“活水”流进俄罗斯都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2

20世纪初,又一位俄罗斯学者阿理克(1881—1951)于1906年来到中国,他就是未来的苏联汉学奠基人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阿理克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苏联文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一生共发表学术著作260多种,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威望的汉学家。他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深知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价值,提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将趋向相互融合的观点,明确反对猎奇心理,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

1920年,阿理克撰写了包括45项内容的《中国典籍翻译提纲》,他自己完成了其中的4项:《中国诗人论诗——司空图〈诗品〉翻译与研究》、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国散文精粹》两卷集、《常道集——唐诗选》(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2003年出版)。而《易经》《诗经》《楚辞》《汉乐府》《陶渊明诗选》《唐诗选》《西厢记》等项,皆由他的几位弟子完成。因此俄罗斯翻译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阿理克还提出了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译诗原则,以诗译诗、以俄语音步对应汉语音节的译诗方法,不仅传达原作的情感、意象,同时再现原作的节奏与音乐性,以期取得动人的艺术效果。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俄罗斯译本多达16个,翻译得最准确、最传神的是阿理克,他的译本不仅用词最少、最简练,而且再现了原作不用人称代词、抒情主人公不出场的巧妙笔法,没有高超的学术造诣,难以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即从1890至1921年,被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其间俄罗斯诗坛相继出现了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巴尔蒙特(1867—1942)、勃留索夫(1873—1924)、古米廖夫(1886—1921)等几位著名诗人都相当关注中国文学与诗歌。

巴尔蒙特不仅是象征派代表性诗人,也是闻名遐迩的诗歌翻译家,他通晓十几门外语,翻译过《道德经》14章,译过李白、杜甫和王昌龄的诗,创作了《中国天空》《中国遐想》等有关中国古代神话的十四行诗,还写出了著名的《太虚》(一译《伟大的虚无》),推崇庄子的思想。在他的诗作中出现了“龙”“凤”“麒麟”,诗人认为这些都是“瑞兽”,是中华民族古代尊崇的图腾。

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被高尔基称为“最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同样通晓多门外语,他创作了《中国诗》组诗,尽力模仿并体现中国诗的简洁凝练,再现句子追求对仗的特征。他还写出了《罗马人在中国》,描述马可波罗访问元大都的历史故事。

古米廖夫是阿克梅派的核心人物,创作了一系列诗歌作品展现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他还借助法国女诗人朱迪特·戈蒂耶(1845—1917)的译诗集《白玉诗书》,转译并出版了《中国诗集——琉璃亭》(1918),并且创作了长诗《两个梦》,对中国龙的描述充满了个性化的想象。

这三位诗人,都具备世界文化的博大情怀,把中国文学与诗歌视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而被誉为“俄罗斯诗坛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1889—1966),不仅创作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抒情诗,还跟汉学家费德林(1912—2002)等人合作,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和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她翻译的李白诗有7首,其中包括《将进酒》《日出入行》和《关山月》等。这位诗人的译笔受到了专家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一致好评。阿赫玛托娃对中国诗歌的爱好,直接影响到接近她的几位年轻诗人,比如布罗茨基(1940—1996)、莱茵(1940—1997)和1936年出生的库什涅尔。

有趣的是未来派诗人鲍勃罗夫(1889—1971)阅读了阿理克的学位论文《中国诗人论诗——司空图〈诗品〉翻译与研究》,借助阿理克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也翻译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并且找到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诗人萧三,得到了萧的认可,于是鲍勃罗夫把这些译诗寄给阿理克过目,二人开始通信,探讨译诗问题,成为俄罗斯诗坛的一段传奇。

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俄罗斯许多文化界人士流亡国外,柏林和巴黎成了俄国侨民的聚居地,有些人则漂泊到中国的哈尔滨,形成了俄罗斯侨民诗人的东方群落,其中最具有成就的诗人当属瓦列里·别列列申(1913—1992)。米哈伊尔·沃林(1914—1997)和尼古拉·斯维特洛夫(1908—1972)的作品也独具特色。

1920年,7岁的瓦列里跟随母亲来到中国,先后在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生活32年,1952年移居巴西。他精通汉语,认同中国文化,把中国称为“善良的继母”和“第二故乡”,认为中国人是“黄皮肤的兄弟”,对中国人的良善与包容深有体会。在上海他结识了戈宝权,1945年11月起在龙果夫任社长的塔斯社工作,跟翻译家草婴成了同事。戈宝权帮助他找到《琵琶行》和《木兰辞》汉语原作,他译成了俄语。侨居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后,他把《道德经》和《离骚》译成俄语。他翻译的中国诗集《团扇歌》,197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为中国文学和诗歌走向世界做出了默默的奉献。诗人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其作品语言洗练优美;相当一部分诗歌题材涉及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与见闻;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绘画、书法与音乐均有所涉猎,从中汲取了养分,因而其作品接近中国诗的风格与情趣。

米哈伊尔·沃林,出生于哈尔滨,16岁开始发表诗作;1937年移居上海,1949年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在中国生活35年之久。他著有诗集《穿越诗行》(1987),其抒情诗形式简洁,诗风明快,充满青春活力,极富灵性。诗人热爱俄罗斯,同样热爱中国。20世纪30至40年代,他深切同情中国人民遭遇的苦难,相信勤劳如蜜蜂、坚韧似黄牛的中国人必定拥有光明的未来,出自他笔下的两首《中国吟》,至今读来令人感动,不禁深深佩服诗人的超前意识以及预判未来的先见之明。

尼古拉·斯维特洛夫,早年生活于哈尔滨,1931年移居上海,1947年返回苏联。他的诗贴近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叙写民风民俗,比如

《中国新年》；《大街上》则描绘了捏面人的手艺人，具有草根性和泥土气息。他跟翻译家戈宝权是好朋友，1948年勃洛克长诗《十二个》汉语译本由时代出版社印行，戈宝权在译后记中写道：“翻译过程中，又承司唯劳夫兄(Н. Светлов)为我解释了许多疑难处，夏清云兄(В. Перелешин)为我校阅过全部译文……现一并在此表示感谢。”^①这里所说的“司唯劳夫”即斯维特洛夫，“夏清云”则是别列列申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

4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从1949年开始，中国和苏联进入了中苏友好的“蜜月期”。中苏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热潮，这期间郭沫若与费德林合作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选》堪称里程碑式的译著。这部四卷本译诗集凝聚着中国和俄罗斯众多学者、诗人和翻译家的智慧与心血。中方参与四卷本《中国诗选》篇目筛选的，除了主编郭沫若，还有郑振铎、余冠英、文怀沙、浦江清、游国恩、李广田等多名教授和学者，他们都是中国文史专家，熟读经典，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这就保证了入选篇目的经典性和系统性，为合作方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俄方主编者费德林，原名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他是阿理克的博士生，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离骚》的俄译本初稿就出自他的手笔，经诗人阿赫玛托娃修改润色得以出版。费德林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在中国生活12年，1939至1947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参赞；此后两年任苏联驻华代办。1950至1952年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兼代办。他接触过中国文化界很多学者，跟郭沫若相当熟悉。由他来担任《中国诗选》的俄方主

^① 李萌：《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60页，注释⑥。

编,是最适合的人选。

费德林把他的老师阿理克的译诗,还有休茨基的译作编进了这部诗选,参与翻译的还有什图金(1904—1963)、艾德琳(1909—1985)、车连义(1925—2003)、孟列夫(1926—2005)、瓦赫金(1930—1981),这几位都是阿理克的弟子。此外还聘请了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阿达利斯(1900—1969)、吉托维奇(1909—1966)参与翻译,由汉学家翻译初稿,诗人加工润色。

《中国诗选》四卷本当时的印数为35000册,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巅峰标志。《中国诗选》的出版,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几千年发展衍变的全貌,其规模堪称世界之最,这部诗集的出版成为苏联汉学界乃至文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是两国文学界、翻译界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典范。中国历代诗人的名篇杰作,经过俄罗斯翻译家的精心翻译,像知时节的春雨一样,洒落民间,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爱诗者的心灵。

5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苏联派遣了大批援华专家来中国工作,许多作家、诗人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人在中国生活的印象,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无形中影响到自己的子女,引出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这里介绍几位诗人和翻译家的经历。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出生于列宁格勒,他父亲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是一名海军军官,1945至1948年作为苏联军事顾问被派遣到中国工作。回国时他给儿子的礼物有中国帆船模型、宝剑、水墨画、陶瓷工艺品渔翁;给妻子的礼物有成套的细瓷餐具,还有衣服和丝绸窗帘。这给8岁的约瑟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那时起就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想象。少年约瑟夫15岁辍学,进入社会凭体力劳动谋生,同时开始了诗歌创作,他的诗在地下刊物发表,有些流传到国外,诗人阿赫玛托娃和汉学家瓦赫金很关注这位步入诗坛的年轻人。不料,他的写作引来了警方的干预,他曾经被关进精神病院,

1964年被审判定罪,判处流放服苦役5年,罪名是“社会寄生虫”。经过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叶甫图申科等人的呼吁奔走,布罗茨基服刑一年半获释,回到了列宁格勒。但他仍然感受到精神压力,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后去了美国。

布罗茨基在美国大学教书写作,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访问中国,因此继续学习汉语。他翻译过李白、王维、孟浩然的诗,也曾尝试翻译《道德经》。他于1977年创作的《明朝书信》,借助安徒生童话、中国历史、想象、虚构以及自身经历,写出了一首内涵复杂、具有象征寓意的作品。他的组诗《蝴蝶》跟庄子的“齐物论”则有内在的呼应与联系。

奥尔嘉·谢达科娃,1949年出生,她的父亲也是援华专家,奥尔嘉六七岁的时候,曾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日子,西直门一带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谢达科娃也是著名诗人、诗歌翻译家。她喜欢老子、庄子的著作,其组诗《中国行》,题词就选自《道德经》。组诗包括18首抒情诗,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垂柳、拱桥、河水、船与天空,有李白和酒,还有占卜和《易经》。诗人仿佛面对一幅水墨画,在想象中神游中国。她所向往的是和谐宁静的天地。这和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主张是直接的呼应。诗人的文字含蓄,从容,生动形象,颇耐咀嚼。

诗人伊戈尔·科博杰夫(1924—1986),1960年来中国访问,在北京见到了溥仪,创作了抒情诗《在紫禁城》,用“皇帝同志”称呼这位已经改造成公民的末代皇帝。回到莫斯科以后,诗人不仅给儿子阿尔焦姆带回了中国玩具,还给儿子讲述中国诗的优美,汉语的声调悦耳动听,这给儿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阿尔焦姆上九年级的时候,参加莫斯科有关中国的演讲比赛,荣获一等奖,此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如今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部主任。他研究王阳明新儒学和《易经》,参与翻译《金瓶梅》,由于主编《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2020年获得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科雅琼就是阿尔焦姆·科博杰夫的汉语名字。

阿尔焦姆不仅给我寄来他父亲的诗作,推荐了诗人凯德林的《中国情缘》,还把自己写的两首诗也让我译成中文。父子两代的诗歌作品同时编入这本诗集,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20世纪70至8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改善,文化交流趋向活跃。这期间有两位诗歌翻译家的译作特别值得关注。

米哈伊尔·巴斯曼诺夫(1918—2006),是外交官、诗人、翻译家。他学习过3年汉语,被派遣到中国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也曾在天津、沈阳、新疆领事馆任职,前后长达20多年。这位外交官的业余爱好是译诗,最大特点是专注于词的翻译。李清照的《漱玉词》(1970、1974)和《辛弃疾词选》(1985)俄译本都出自他的译笔。1988年出版的《玉笛声》选译了从唐宋到清朝47位词人的284首词作,印数3万册,这对于中国“词”这种诗体在俄罗斯的译介与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提高了李清照和辛弃疾的知名度。巴斯曼诺夫翻译词,重视节奏和音韵,侧重俄罗斯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因而颇受诗歌爱好者的青睐。有些诗人受到他的影响,创作了诗篇赞美或同情李清照,比如阿拉·利普尼茨卡娅和叶列娜·洛克的作品。

车连义是汉学家、诗歌翻译家列昂尼德·切尔卡斯基的汉语名字。他是著名汉学家艾德琳的学生,1962年以论文《曹植的诗》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2年以论文《中国的新诗》获得博士学位。在苏联诗歌翻译家当中,他是唯一专注于中国新诗的翻译家,主要译著有《雨巷(中国20—30年代诗歌)》(1969)、《五更天(中国30—40年代诗歌)》(1975)、《蜀道难(中国50—80年代诗歌)》(1983)。这三本译诗集所选译作品年代具有系统性,共选译了95位诗人的434首诗,呈现了中国新诗20世纪20至80年代创作发展的概貌。此外,车连义还翻译了艾青诗选《太阳的话》(1989),撰写了艾青评传《太阳的使者》(1993)、徐志摩评传《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1997)。苏联解体以后,车连义1992年移居以色列。

诗歌翻译家车连义,也擅长写诗。他创作的《陆游之歌》不仅称赞了汉学家谢列布里雅科夫对陆游的研究,也塑造了诗人陆游个性